

在「邊緣」建立「中心」  
——法國耶穌會士桑志華與天津北疆博物院

戴麗娟

輔仁歷史學報第二十四期抽印本  
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印行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出版



## 在「邊緣」建立「中心」—— 法國耶穌會士桑志華與天津北疆博物院\*

—戴麗娟—\*\*

### 中文摘要

學術中心與邊緣的不對等關係是歷史的產物而非天然形成，此類關係形成後亦非固定而不可改變。本文以法國耶穌會士桑志華神父為例，描述他在中國天津建立北疆博物院的過程，並進一步分析該神父與位於巴黎的法國國立自然史博物館在科學合作上的緊張關係，以及他為追求北疆博物院主體性所做的努力。

關鍵詞：桑志華 北疆博物院 耶穌會士 自然史博物館

\* 本文初稿曾在輔仁大學歷史系主辦的第五屆文化交流史：「中心」與「邊緣」的互動國際學術研討會中發表，筆者在此特別感謝評論人房志榮神父的鼓勵，以及與會學者的提問與建議。此外，陳方中教授在會後不忘寄贈中國天主教相關參考資料，筆者由衷感激，謹於此再申謝忱。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 **Building the “Center” on the “Periphery”: The French Jesuit Emile Licent and the Tianjin Musée Hoang Ho Pai Ho**

**Li-Chuan Tai\***

## **Abstract**

In the academic field, the uneq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er and the periphery is a product of history rather than a natural formation, and this kind of relationship is not one which is forever fixed and unchangeable. This article takes the case of the French Jesuit Emile Licent as its focus, and analyses the ways in which Licent built the Musée Hoang Ho Pai Ho (a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in Tianjin), the tension pervading his scientific cooperation with the French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in Paris, as well as his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and respect for his museum in China.

**Keywords:** Emile Licent, Musée Hoang Ho Pai Ho, Jesuits, natural history museum

---

\*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 在「邊緣」建立「中心」—— 法國耶穌會士桑志華與天津北疆博物院

——戴麗娟——

- 一、桑志華神父在華的科學活動
- 二、桑志華與法國自然史博物館往來關係
- 三、結語

自從大航海時代以來，西歐主要國家對外探勘、擴張的結果，使得世界上過去遺世獨立的地區逐漸互有往來。新地區的開拓帶來新物種的發現或新應用方式；以植物為例，不論是純粹好奇、商機所趨，或是有實際醫病救人的應用需求，許多原生於歐洲以外的植物，例如煙草、咖啡、茶葉、棉花、甘蔗、橡膠樹、金雞納樹等等被帶到歐洲研究，又透過殖民者被帶到亞洲、非洲、美洲其它地區種植，其中部份經濟作物因為商業利潤高而被大量生產或大量移植，其散播的程度之廣，影響了全球人類生活的面貌。

在這樣的發現、開發、移植、傳播、應用的過程中，殖民帝國中心的植物學家扮演了重要的諮詢與顧問的角色。為了回應實際需求所做的調查往往也刺激了新知識領域的拓展，於是某些植物學家，例如曾經參加過 James Cook (1728-1779) 第一次澳洲探險的 Joseph Banks (1743-1820)，開始從原

本被動受諮詢的角色，轉而主動利用帝國的優勢，為自己從事的研究領域規劃新的拓展版圖。倫敦邱園（kew Gardens）便在他的主導和繼任主任的努力下，從原本僅供皇室休憩娛樂的花園，在 1770 年代後逐漸變身為世界上最大的植物標本中心以及經濟作物研發中心。<sup>1</sup>大量收集、鑑定、分類、開發應用地球現存植物品種成了該植物園的首要任務。為了獲得更多的植物標本，植物園主事者以種種方式動員、組織可以到海外尋找新物種的「植物獵人」，並且利用各個殖民地的生態環境特性，有計畫地移植生產具有重要應用價值或高利潤的植物。這樣的觀念和運作模式也引起其它國家的植物園起而效尤，位於法國巴黎的皇家藥用植物園（Jardin royal des plantes médicinales），儘管成立時間較早（1635），卻要等到 Buffon（1707-1788）主事的時期（1739-1788），才建立起相當的規模，而且在大革命時期被國有化並改為國立自然史博物館（Muséu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 1793）後，以更積極的方式來組織這樣一個在世界各地採集與運送標本到法國的長程網絡。<sup>2</sup>當時博物館的主事者懂得利用國家擁有海外殖民地的有利條件，多方收集和瞭解世界各地所存在的古今物種，其中許多物種其實沒有立即的經濟效應，而是學者為了擴充知識的需要，為植物園和自然史博物館收藏的。<sup>3</sup>從十八世紀後期開始，在學者愈來愈重視標本收集和分類系統建立的同

<sup>1</sup> 邱園內的多項設置雖然是在十八世紀中葉陸續完成的，但是一般以 1759 年為該皇家植物園的啟建年代。有關邱園在英國殖民擴張中所扮演的角色，可參考：Lucile H. Brockway, *Science and Colonial Expansion: the Role of the British Royal Botanic Gardens*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first published in 1979 by Academic Press, Inc.).

<sup>2</sup> 有關巴黎植物園在法國殖民地經濟作物的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可參考：Christophe Bonneuil, *Mettre en ordre et discipliner les tropiques: les sciences du végétal dans l'empire français, 1870-1945*, thèse doctorale (Paris: Université Paris VII-Denis Diderot, 1997).

<sup>3</sup> 有關西方國家自然史博物館在十九世紀後半期快速發展的現象，以及這個現象與殖民的關係之探討，可參考 Sheets-Pyenson, Susan. *Cathedrals of Science: the Development of Colonial Natural History Museums during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時，整個自然史的知識生產也有愈來愈集中化的趨勢。<sup>4</sup>能夠擁有最多標本種類的植物園與博物館，就愈有可能建立起放諸四海皆準的分類標準，在學術領域就愈佔有權威、中心的地位，這也是為什麼倫敦的邱園或巴黎的自然史博物館能夠在以世界物種為對象的資料蒐集網絡中，居於「計算中心」（center of calculation）的地位，扮演統整資訊、提供分類原則、產生科學知識的角色。<sup>5</sup>

在這樣的背景下，如何能夠有效地運用遠行人員順便為植物園或博物館收集標本，並且讓這些人員在各種困難的條件下盡量保持標本的完整性，也就是維護這些標本或資料運送的過程等等，變成是處於帝國中心自然史博物館的學者相當重要的工作。在動員人力方面，在專業的自然史學者不可能親身前往世界各地採集標本的情況下，傳教士、船醫、海軍軍官、外交人員、往返殖民地的商人與官員等等，都曾經是自然史學者寄託、網羅的對象。<sup>6</sup>同時，為了提供給這些程度不一的業餘自然史愛好者在遠地收集標本的標準工作流程，自然史學者將想問的問題、想找的材料、採集時該注意的事項、運送時該留心的細節等等記錄下來，交付給遠行者。這類要點提示的文件從十八世紀中葉出現，逐漸形成一種文類，在十九世紀的地理學會、自然史學會、人類學會、博物館等機構相當盛行，一般稱之為「工作指南」（instruction）。除此之外，巴黎自然史博物館也曾經為這些業餘自然史愛好者開設行前短期

---

(Kingst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88).

<sup>4</sup> Marie-Noëlle Bourguet, "La collecte du monde : voyage et histoire naturelle (fin XVII<sup>e</sup> siècle-début XIX<sup>e</sup> siècle)", in Claude Blanckaert et al. (eds.), *Le Muséum au premier siècle de son histoire* (Paris: Editions du Muséu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 1997), pp. 163-196.

<sup>5</sup> 有關「計算中心」的概念，見 Bruno Latour, *Science in Action: 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P, 1987), pp. 215-257.

<sup>6</sup> Yves Laissus, "Les voyageurs naturalistes du Jardin du roi et du Muséum d'histoire naturelle: essai de portrait-robot", *Revue d'Histoire des sciences*, 34.3-4 (1981): 259-317.

訓練課程，讓有餘裕參與的人士能夠學習認識各類標本及採集的技巧，尤其是包裝及運送標本的各個環節。<sup>7</sup>對於長期合作、持續寄送標本的人士，博物館也會給予某種認證，例如授予國立自然史博物館通訊員（Correspondant du Muséum）之類的頭銜和證書，以彰顯其專業性。<sup>8</sup>

綜合以上所述可知，這樣一個長程網絡的維繫需要相當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來支撐，所以往往是資本雄厚的國家級科研機構才有能力在承受許多失敗案例之後，仍然能夠持續進行，累積龐大數量的標本。從這個角度來看，科學上帝國主義的作法，與政治經濟上的帝國主義實有不可否認的密切關係。在有計畫地擴展搜尋範圍、擴大收集規模、提高研究和發表數量後，這些機構在成果的累積上，自然而然地形成某種學術中心，而缺乏這樣的學術組織概念或缺乏人力與物力支持的地區，自然而然地變成學術邊緣。這種中心與邊緣關係實非自然天成，而是歷史造成，雖不是不可動搖，但是日積月累，邊緣的確不易突破中心宰制的局面。這樣的現象在昔日具有殖民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關係的地區尤其明顯，至於所謂的半殖民地或勢力範圍，例外的情況是有可能出現的。

本論文所要探討的個案——法國耶穌會士桑志華（Emile Licent, 1876-1952）與他在中國華北所建立的北疆博物院——便為這類例外提供了一個例證。在華旅居二十四年（1914-1938）之久的桑志華在 1922 年開始在

<sup>7</sup> Marie-Noëlle Bourguet, “La collecte du monde : voyage et histoire naturelle (fin XVII<sup>e</sup> siècle-début XIX<sup>e</sup> siècle)”, p. 169-186.

<sup>8</sup> 在巴黎自然史博物館的歷史裏，這個頒發頭銜與證書給遠行採集者的作法最早可追溯到 Buffon 時期。他在 1740 年代初期，即請當時路易十五手下的國務大臣 Jean Frédéric Phélypeaux de Maurepas (1701-1781) 通過該項制度，由國王頒發給表現出色的遠行採集者「皇家植物園通訊員證書」(brevet de correspondant du Jardin) 或「國王御閣通訊員證書」(brevet de correspondant du Cabinet du Roi)，以資獎勵。見 P. Huard, M. Wong, “Les enquêtes scientifiques françaises et l'exploration du monde exotique aux XVII<sup>e</sup> et XVIII<sup>e</sup> siècles,”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52.1(1964): 143-155.

天津建立一個專門容納他本身採集與發掘成果的博物館，法文名為黃河白河博物館（Musée Hoangho Paiho），<sup>9</sup>中文名為北疆博物院。此博物館於 1928 年正式對外開放，以自然史藏品聞名，據稱是當時中國北方少有的現代博物館，在自然史方面尤其是規模最大的。從桑志華神父的博物館建設事業中所表現出的一些特色，以及他在華期間與法國國立自然史博物館的往來情形來看，我們甚至可以說，他似乎企圖在二十世紀初中國這個尚處於世界自然史學術研究「邊緣」的地方建立一個「中心」。

為了說明筆者對這個個案所做的初步觀察，<sup>10</sup>本文將分兩部份來分析。第一個部份主要說明桑志華神父來華後的科學活動，其中包括三個面向：第一是他個人的田野工作情況，第二以他的博物館建設為主，第三個面向則是有關於他所建立的資料蒐集網絡。第二部份則是分析他在華期間與法國機構，尤其是法國國立自然史博物館之間的往來情況。事實上，與法方關係的變調，也促使桑志華更加強他在華維護其博物館主體性的決心。所以少數論及此題的文章，在末了不能免俗地譴責當時西方人將出土物件運送到國外的情形，而將桑志華也歸於此類，殊不知桑志華算是當時少數極有意識要將自己採集或發掘的物件留在中國的西方人士。<sup>11</sup>

## 一、桑志華神父在華的科學活動

桑志華神父，1876 年 12 月 16 日生於法國北方與比利時相鄰的 Rombies

<sup>9</sup> 此處博物館的拼音乃依循當時文件上所採用的方式，與現行漢語拼音稍有出入。

<sup>10</sup> 此篇論文乃筆者所執行之國科會專題計畫：「當宗教任務與科學任務相遇——桑志華神父的北疆博物院與科學資訊網絡」（NSC97-2410-H-001-022-MY3）的部分成果，由於計畫仍在進行中，故此處只能說是初步觀察所得，並非最終結論。

<sup>11</sup> 于樹香，〈近代法國傳教士對我國北方的科學考察與天津北疆博物院〉，《歷史教學》（天津）2002.6：35-39。此短文不乏有資料錯誤之處。

地區。<sup>12</sup>他在 1895 年 12 月 12 日進入耶穌會初修，時年十九。經過完整的神職人員訓練後，他在 1909 年 8 月 29 日被正式授與神父神品。在同一段時間內，他也繼續學業的追求，並且由於對自然科學方面的興趣，在 1913 年 6 月 27 日在南斯（Nancy）大學取得動物學方面的博士學位。論文題目是：「高等同翅目昆蟲消化道的比較解剖與生理學研究」（*Recherches d'anatomie et de physiologie comparées sur le tube digestif des Homoptères supérieurs*）。也就是說，在神職人員的身份外，他在動物學，尤其是昆蟲學方面，接受過專業訓練。

有關傳教地區，桑志華原本想選擇非洲或馬達加斯加島等法屬殖民地，但是因為無法適應炎熱的氣候，所以很快就決定到緯度與家鄉相當的中國北方。由於耶穌會重視智識活動的傳統，使得桑志華可以免去一般主持彌撒、講解教義或濟貧等傳教方式，而專注在他已經培養專長的科學工作上。在正式出發到中國之前兩年，他開始學習中文，並且進一步規劃自己在華的任務（mission）。他打算在中國北方進行自然史方面的採集活動，也就是對於該地區的動植物、古生物、地質礦物等等做廣泛的發掘和研究，並且籌建一座博物館來研究和展示這些成果。這個規劃一方面是受到師長的鼓勵，另一方面也是受到一位前輩耶穌會士韓伯祿（Pierre Heude, 1836-1902）神父事蹟的啓發。韓伯祿在 1868 年初到達上海，在長江流域等地廣泛地進行生物標本採集和調查，由於蒐集到的標本數量頗大，在沒有預先規劃的情況下，在南京先成立了一個標本陳列館。<sup>13</sup>1883 年，該館館藏被移至上海徐家匯一棟新建築內，到了 1931 年，又移到震旦大學內，中文取名為震旦博物館，外文

<sup>12</sup> 以下有關桑志華赴華之前的生平經歷主要是參考：Claude Cuénot, “Le Révérend Père Émile Licent S.I.”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s études indochinoises* 41(1966): 9-83.

<sup>13</sup> 有關韓伯祿在中國初期的情況，可參考 Joseph Dehergne S. J., “Les débuts d'un naturaliste en Chine: les premiers voyages du Père Heude d'après son Journal et ses Lettres (1868-1875),” *Bulletin de l'Université l'Aurore*, Ser. 3, 30(1947): 192-243。

名稱則為了紀念韓伯祿而取為 Musée Heude，而整個館藏的規模也隨著接任的耶穌會士的投入愈來愈大。<sup>14</sup>有鑑於上海徐家匯的自然史博物館所蒐集的標本集中在中國南方和東南亞地區可尋得的物種，桑志華神父因此想在北方建立一個規模相當，但是以研究中國北方物種為主的自然史博物館。這樣的想法很快地得到教會上層主事者的支持。

他在一份規劃書中這樣寫到他設想的工作藍圖：

1. 有步驟地訪查中國北方各省以及西藏、蒙古一帶，也就是黃河、白河流域，以及其他流入北直隸灣的河流。
2. 將此地區有關動物學、植物學、地質學等方面的材料匯集起來，盡可能地整理成完整的系列收藏，這不是為了建立一個公共博物館（雖然這樣的想法並不被排除），而主要是為了建立一個資料與資訊流通中心。
3. 出版有關於這個領域的研究，這些研究或是交給一些針對這些標本進行研究的專家，或是委託給長期駐留在當地的傳教士來進行。
4. 將這些研究材料寄給歐洲的科學機構，或者是在中國本地所建立的科學機構。<sup>15</sup>

<sup>14</sup> 有關此博物館的簡史，可參考 Octave Piel S. J., "Le 70<sup>e</sup> Anniversaire du Musée Heude," *Bulletin de l'Université l'Aurore*, Ser. 2, 38(1938-1939): 8- 46; 39(1938-1939): 56-59.

<sup>15</sup> « 1. Explorer méthodiquement les provinces du Nord de la Chine et leurs marches tibétaines et mongoles, c'est-à-dire tout le bassin du Fleuve Jaune (Hoang-ho), de la rivière de Tientsin et de Pékin (Pai-ho) et des autres cours d'eau tributaires du Golfe de Pei-tche-li. 2. Réunir tous les matériaux d'études zoologiques, botaniques et géologiques dans ce domaine, en des collections aussi complètes que possible, non pas précisément en vue d'un musée public (bien que l'idée n'en soit pas exclue) mais d'abord et surtout en vue d'un service documentaire et de renseignement. 3. Publier toutes études afférentes à ce domaine, faites par des spécialistes sur les collections ainsi constituées ou proposées aux missionnaires résidant dans le pays. 4. Envoyer des matériaux d'études aux établissements scientifiques d'Europe, ou à ceux qui pourraient être établis en Chine même. » Cf. Paul Bornet, "Le Père Emile Licent (1876-1952),"

從這簡短的規劃書中，我們就已經可以看出桑志華神父在還未出發到中國之前，就因為受到前輩的啟發，而有興建博物館的想法。其目的簡單地說，是要探勘尚未被大量發掘的地區，之後是建立一個資料集中處，讓相關研究者有一個可以在其中進行系列研究的地方，之後這些研究應該被出版。另外，就是要將這些收集到的材料也寄給在歐洲的科學機構，或者是在中國當地建立的科學機構研究。他的大部份規劃到了中國之後一一實現，不過他與法國科研機構的關係卻不如預期，這點將在第二部份做討論，以下先說明他個人的考察活動和博物館相關事業。

### （一）個人田野考察活動

由於桑志華本身隸屬於法國香檳區教省（province de Champagne），抵華後便被安排在由此教省傳教士負責的直隸東南教區。<sup>16</sup>此處是耶穌會在1856年就開始紮根經營的一個地方，與教會所屬各地教堂有著密切聯繫，為桑志華神父的考察活動提供便利的條件。桑志華被安排落腳在崇德堂，是教區帳房所在地，他初期收集的各類標本也都存放在此處。從1914年7月開始，桑志華神父對黃河流域展開系統性的踏查活動。<sup>17</sup>帶著漢族或蒙族的翻譯和廚子，或騎馬，或坐篷車，桑志華神父的足跡很快就踏遍華北地區。在他一份出版於1926年的考察紀錄中，他提到，從1914年到1925年，他就行經了五萬公里的路程，所採集到的化石、礦物和昆蟲標本已經超過崇德堂可以容納的限度。事實上，在旅華初期，他的考察以地理、風土民情考察為主，採集的對象是現存生物標本和民俗人類學物件，1920年後才集中在古生物

*China Missionary Bulletin*, 1952: 729-734, p. 729.此段引文為筆者之翻譯。

<sup>16</sup> 此地原屬北京主教區所管轄，1856年5月30日後分成三個宗座代牧區（地位等同於教區）：冀北、冀東南、冀西南。見趙慶源編著，《中國天主教教區劃分及其首長接替年表》，台南：聞道出版社，1980，頁36。其中冀東南由耶穌會負責，1924年改名獻縣代牧區。

<sup>17</sup> Emile Licent, *Douze années d'exploration dans le nord de la Chine, en Mongolie et au Tibet (1914-1925)* (Tientsin: Musée Hoangho Paiho de Tientsin, 1926), pp. 4-5.

化石和史前石器的挖掘。在這個領域，桑志華的發掘成果在短時間內就極為豐碩，其中最著名的有以下幾項。首先是 1920 年，他在隴東黃土高原發現三趾馬動物群化石。同年，在甘肅慶陽北面更新世晚期黃土堆積中又發現三件人工打製的石製品（一件石英石核和兩件石英石片）。經鑑定後，這批石器被認為是在中國土地上發現的第一批有確切層位的舊石器。也就是說，中國最早出土、有層位紀錄的舊石器，是桑志華在 1920 年 6 月 4 日在甘肅慶陽縣城北約 55 公里處，叫做辛家溝的黃土堆中發現的。<sup>18</sup>這個發現據說也修正了當時認為「中國無舊石器時代人類」的想法，並且進一步刺激了人們在中國尋找早期人類化石的想法。<sup>19</sup>另外，1922 年，他根據一位名叫旺楚克（Wansjok）的蒙族當地人所提供的線索，在鄂爾多斯高原東南角發現薩拉烏蘇遺址（今內蒙古自治區伊克昭蒙烏審旗境內），也就是一般所稱的河套人遺址。<sup>20</sup>也是這個發現，促使桑志華在同年寫信給認識多年的德日進，詢問他來華工作的意願，德日進才得以藉此機會到達中國，進行他在歐洲之外的第一次田野實地發掘。<sup>21</sup>

這個時期，桑志華的重大發現已經為他帶來相當的知名度，當時中國當地關心考古的人士都注意到這位法國神父的工作，例如胡適在一篇談文字材料之不足的文章就提到他的發現：

河南發現了一地的龜甲獸骨，便可以把古代殷商民族的歷史建立在實

<sup>18</sup> 黃為龍，〈我國最初發現的舊石器地點究竟在哪裡？〉，《化石》1979.3: 29；謝燕萍、游學華編著，《中國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址》（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4），頁 156。

<sup>19</sup> 賈蘭坡、黃慰文，《周口店發掘記》（天津：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1984），頁 20。

<sup>20</sup> Emile Licent, *Dix années (1914-1923) dans le bassin du fleuve jaune et autres tributaires du golfe du Pei Tcheu Ly* (Tientsin: La Librairie française, 1924), p. 1508.

<sup>21</sup> Emile Licent, *Dix années (1914-1923) dans le bassin du fleuve jaune...*, p. 1559. 兩人在 1910 年代就認識，在桑志華抵華後，兩人陸續有書信來往，德日進早先已表示來華進行田野工作的意願，見 Claude Cuénot, “Le Révérend Père Émile Licent S.I.,” p. 29。

物的基礎之上。一個瑞典學者安特森 (J. G. Anderson) 發現了幾處新石器，便可以把中國史前文化拉長幾千年。一個法國教士桑德華 (Père Licent) 發現了一些舊石器，便又可以把中國史前文化拉長幾千年。北京地質調查所的學者在北京附近的周口店發現了一個人齒，經了一個解剖學專家步達生 (Davidson Black) 的考定，認為遠古的原人，這又可以把中國史前文化拉長幾萬年。向來學者所認為紙上的學問，如今都要跳在故紙堆外去研究了。<sup>22</sup>

1924 年，桑志華將自己過去十年的旅行考察生活記錄出版成書，名為《在北直隸灣的黃河流域及其它支流的十年生涯》(*Dix années (1914-1923) dans le bassin du fleuve jaune et autres tributaires du golfe du Pei Tcheu Ly*)，共四大冊，一千五百多頁。<sup>23</sup>這套書雖在天津出版，但以法文寫成，在當時法國專門研究中國的學者圈內頗受重視，在巴黎地理學會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 de Paris)、銘文與美文學院 (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都獲獎。1927 年，桑志華更因為他的著作和博物館建設等等，獲得法國政府的騎士勳章 (Chevalier de la Légion d'Honneur) 榮譽。同年，他也獲頒中華民國政府的五級金穗 (Médaille du 5<sup>e</sup> degré de l'Epi d'Or de Chine) 勳章的榮譽。<sup>24</sup>這些種種都顯現他在華北所進行的科學活動已經受到各方相當的肯定。1920 年代末期，博物館正式對外開放，他的工作重心也逐漸從田野實地考察行程轉移至博物館事業上。

## （二）博物館建設

在博物館方面，原本桑志華早期所累積的標本是放在天津崇德堂。1921

<sup>22</sup> 胡適，〈治學的方法與材料〉，《胡適文存·三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30）；後收入《民國叢書·第一編》（上海：上海書店，1989），綜合類，第 95 冊，頁 204。此處引文中之人名寫法乃照胡適原文抄錄，雖原文有錯，並未將之改正。

<sup>23</sup> 其中第四冊為獨立成冊的詳細目錄。

<sup>24</sup> 見 Claude Cuénot, “Le Révérend Père Émile Licent S.I.,” p. 10.

年，耶穌會趁著興建天津工商大學（Ecole des Hautes Etudes industrielles et commerciales）之便，決定在該校址同時容納一個博物館，也就是北疆博物院，地址是天津馬場道 35 號。<sup>25</sup>全部完工後的博物院是一個由三棟樓合成的建築物。首先完成的主樓是後來稱作北樓的建築物，1922 年春動工，佔地 300 平方公尺。後來為了滿足藏品存放和陳列的需求，分別在主樓的西端和南端又興建了另外兩棟。1925 年先是西樓開始動工，1929 年才輪到南樓，整體面積有 1640 平方公尺。整個建築是在 1930 年代中期才大功告成，完成後的建築平面呈工字型，北樓與南樓之間有封閉式天橋相連。由於三個樓房相當獨立，博物館本身沒有等到南樓興建完畢便決定在 1928 年 5 月正式對外開放。5 月 5 日開幕典禮當天，各國駐天津之領事館、軍隊司令部、直隸省公署等等皆有代表應邀參加。<sup>26</sup>當時展出的標本數量，植物類的有 20000 件、動物標本 35000 件、岩石與礦物標本 7000 種，動物化石也不少。另外還有地圖、照片，以及各地人類學、工商農業類的報告供人參考。

如前所述，桑志華對於北疆博物院的規劃，是將博物館視為一個研究中心，而不是一個單純的陳列室。因此在當時博物館發行的一些法文出版品上，有時可以看見博物館的全名寫成 Musée-Laboratoire Hoangho Paiho（黃

<sup>25</sup> 天津工商大學是當時中國三所天主教大學之一，另外兩所為震旦大學（創於 1903 年）和輔仁大學（創於 1925 年）。該校校名幾經異動，最初取名為天津工商大學，但因所設科系數量未達當時大學之標準，在 1933 年向教育部註冊時改為天津工商學院，此後加強科系設置，在 1948 年獲准重新註冊為私立津沽大學。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該校先是被批准改為國立津沽大學，在 1952 年秋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後，津沽大學工、商兩學院另立，而以師範學院為基礎，在原校址改建為天津師範學院，1958 年又調整為天津師範大學，1960 年改為一綜合性大學，定名為河北大學，該校並且在 1970 年由天津市被遷移到河北省保定市。變遷細節請見《河北大學史》編纂委員會編，《河北大學史》，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1。筆者於此要特別感謝在該校校史編纂工作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呂志毅教授慷慨贈予此書。

<sup>26</sup> 《河北大學史》編纂委員會編，《河北大學史》，頁 105。

河白河博物館—實驗室）。<sup>27</sup>這樣的博物館觀念在 1920 年代初提出，其實頗為先進。因為現在法國學界一般在談論博物館—實驗室（Musée-Laboratoire）這個概念時，都會以 1930 年代末期成立的人類博物館（Musée de l'Homme）為例，並且認為當時的兩位主事者，Paul Rivet 和 Georges Henri Rivière，是這方面的先導。<sup>28</sup>從桑志華在 1920 年代初就使用這個名詞看來，這個概念的淵源應該還要更早。也因為這個概念，桑志華將博物館分為公開與私存兩部份，<sup>29</sup>所謂私存部份，其實就是保留給研究者研究的系列收藏的部份，桑志華稱之為研究博物館（Musée d' études），而公開的部份只選最完整、最具代表性的標本陳列，桑志華稱之為公共博物館（Musée public）。<sup>30</sup>例如館內最有名的藏品之一：披毛犀（*Rhinoceros tichorhinus*）的完整骨架，據桑志華的說法，當時世界上只有三具，都是他挖掘的成果，兩具在北疆博物院，一具由他送給法國自然史博物館研究。而在北疆博物院的兩具，一具放在公開陳列室，另一具便是在放在研究博物館內。

也因為這個研究勝於陳列的概念，博物館不定期有各國學者在館內做長期研究，其中一些是神職人員，例如耶穌會的德日進、羅學賓（Pierre Leroy）、湯道平（Maurice Trassaert），幫忙整理鳥類標本的比利時聖母聖心會神父 G. Seys；也有很多非神職人員，例如俄籍學者 Peter A. Pavlov、B. P. Jakovleff、V. Strelkov 等，主要負責整理動、植物類的標本。除了提供研究的環境，桑志華也以博物館的名義出版了許多藏品目錄和研究報告，正如

<sup>27</sup> 例如該博物館的館徽就顯現這樣的字樣（見附錄一）。而當時多份文件，例如以下會提到的一份 1921 年出版的採集指南的封面，亦印有 Musée-Laboratoire Hoang-ho Pai-ho 的字樣。

<sup>28</sup> 例如 Isac Chiva, “Le Musée-laboratoire, service public de la recherche.” *Ethnologie française*, 1(1987): 61-63.

<sup>29</sup> 見 Emile Licent, *A Guide to Hoang ho Pai ho Museum* (Tientsin: Musée Hoanghe Paiho, 1937), p. 2。

<sup>30</sup> 見 Emile Licent, *Douze années d'exploration dans le nord de la Chine...*。

他當初的規劃。<sup>31</sup>

### (三) 標本蒐集網絡

在博物館方面，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館藏的來源。因為北疆博物院之所以能夠快速地累積大量的標本，除了桑志華本人的實地採集之外，大多是倚賴派駐在中國北方各地的傳教士。身為神職人員的桑志華懂得利用教會為了傳教而在各地建立據點的特性，也瞭解某些生活在偏遠地區的傳教士日常工作中必須徒步拜訪當地教徒，而對該地區地形地貌熟知的特性，不僅在自己遠行時利用這些教堂當落腳處，也開始動員各地對自然史知識有興趣的傳教士為他提供自然環境方面的資訊（如地震、旱災、風災、水災等等），以及收集和寄送標本。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所建立的標本蒐集網絡，並不限於本派教士，也擴及天主教其它教派。

為了有效地動員這些傳教士，桑志華運用了歐洲植物園或自然史博物館的作法，建立了一個有效的標本來源組織方式。而且由於他把對象集中在長駐當地的傳教士社群，產生了加倍的效果。

他首先仿效歐洲那些本身未必遠行收集標本的博物館自然學者，著手編寫「指南」(instruction)。他在 1921 年以法文撰寫成一份採集指南，並以黃河白河博物館的名義刊行，廣發給華北地區的教會。在這份名為：《召告傳教士以及有關採集與寄送自然史物件之說明》(*Appel aux missionnaires et renseignements pour la récolte et l'envoi d'objets d'histoire naturelle*) 的小冊中，桑志華呼籲傳教士可在工作之餘，為增進中國自然史之認識來貢獻己力。桑志華在手冊開頭提到，過去在田野受到不同據點的教士幫忙，其中多人表示對自然標本採集有興趣，但是不知如何能夠發揮效益。為了讓有興趣但是未必有專門訓練的這些傳教士苦心不白費，也就是要讓標本能夠完整無

<sup>31</sup> 博物館初期出版目錄可見 Emile Licent, *Bibliographie critique du Musée Hoanghe Paiho de Tien Tsin (1914-1933)* (Tientsin: Musée Hoanghe Paiho, 1934).

缺地寄到天津北疆博物院，桑志華在這份十八頁的小冊中，分四部份很實際地講解各個領域的標本如何採集、如何製作，如何包裝和運送，每個環節應該注意的細節，並且附上示範圖等等。<sup>32</sup>

事實上，桑志華的觀察是準確的。傳教士由於長期駐守一地，對地區的環境有長期的觀察，而且因為傳教關係，對於當地語言、人文、風土民情有一定程度的瞭解，與一般短期探勘的探險家、走馬看花的觀光客不同，所以他們能夠提供的標本和遺址情報超乎想像地豐富。例如前面提過的鄂爾多斯高原東南角薩拉烏蘇遺址，便是兩位傳教區在內蒙古的比利時聖母聖心會修士 Mostaert 和 Léo de Wilde 經過當地蒙人旺楚克告知後，將訊息提供給桑志華的。<sup>33</sup>而桑志華也在他出版的四大冊考察旅行記錄中一一寫出這些神父或其他遺址情報提供者的名字。根據一份初步統計的資料，曾經寄送資料給他的不只是修士，也有修女！而且不止歐洲派來的教士，也有十多名中國教士加入了這個採集標本或通報疑似考古遺址的行列。包括比利時聖母聖心會（95 人）、聖方濟會（47 人）、耶穌會（39 人）、遣使會（29 人）、聖母小昆仲會修士（Frères Maristes，5 人）等等，共有將近三百人曾經定期或不定期地寄送遺址資訊或生物標本給桑志華。<sup>34</sup>北疆博物院也成了這些傳教士經過天津時一定會拜訪的地方。

事實上，不止天主教傳教士，國際間許多對自然史有興趣的學者若不是專程前往天津，在經過北京時也會順道到天津參觀這個博物館。例如瑞典皇太子（Gustaf Adolf）在 1926 年秋冬到中國訪問時，也在發現仰韶文化的瑞

<sup>32</sup> 第一部份說明的是植物類、第二部份有關動物類、第三部份則是與地質、岩石、礦物和古生物化石有關、第四部份則是人類學物件。

<sup>33</sup> Emile Licent, *Dix années (1914-1923) dans le bassin du fleuve jaune et autres tributaires du golfe du Pei Tcheu Ly*, p. 1508.

<sup>34</sup> Henri Bernard, S. J., “Une méthode d’exploration scientifique : Le P. Licent dans la Chine du Nord et la collaboration des missionnaires,” *Bulletin catholique de Pékin*, 1925.12: 443-454, 1926.1: 17-23.

瑞典學者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的陪同下，參觀北疆博物院。<sup>35</sup>當時桑志華與德日進還把他們在水洞溝挖掘到的標本送了幾件給安特生。<sup>36</sup>另外在 1926 年歲末，法國科學院常務秘書，本身也是法國國立自然史博物館的礦物學教授 Alfred Lacroix 趁著到亞洲開會之便，在德日進的陪同下，在中國華北進行了一番地質考察，也參觀了兩位神父在北疆博物院整理的出土化石。又如在康乃爾大學任教的知名昆蟲學家 James G. Needham 在準備一份由北平靜生生物調查所出版的中國蜻蜓類研究專書期間，也曾經到北疆博物院調閱標本。<sup>37</sup>另外，法國知名漢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在 1933 春也曾經在法國駐華大使 Auguste Wilden 陪同下，接受工商學院的邀請，參觀了該校和博物館。<sup>38</sup>除了西方學者之外，桑志華的工作似乎也受到日本相關學界的重視。1930 年底，桑志華被日本人類學會邀請到當地大學演講，<sup>39</sup>同時日

<sup>35</sup> 安特生本人曾在 1914-1925 年間在中國擔任農商部的礦政顧問，回到瑞典後積極規劃成立東方博物館（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並擔任第一任館長。有關他與中國史前學的淵源，可參考 Magnus Fiskesjö and Chen Xingcan, *China Before China: Johan Gunnar Andersson, Ding Wenjiang, and the Discovery of China's Prehistory* (Stockholm: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2004)，此書為英、中雙語版。

<sup>36</sup> Johan Gunnar Andersson, *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LTD., 1934), p. 150.

<sup>37</sup> James G. Needham, *A Manual of the Dragonflies of China. A Monographic Study of Chinese Odonata* (Peiping: The Fan Memorial Institute of Biology, 1930).

<sup>38</sup> 解成編著，《基督教在華傳播系年·河北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頁 525。此書附錄收有〈天津工商學院簡史〉(頁 514-557)，係從早期獻縣教區主教趙振聲的一份翻譯自拉丁文的手稿而來，著者可能是曾經主持工商學院的耶穌會士。不過可能由於是抄錄自手稿，字跡辨識不易，這份文件中提到的外國人名有許多拼寫上的錯誤，倒是編年大事應該值得參考。

<sup>39</sup> 此次到日本演講的文稿後來在日本東京人類學學會刊物出版：“Les gisements néolithiques représentés au Musée Hoangho Paiho de Tientsin,” *Journal of the Anthropological Society of Tokyo*, vol. 46, n 2-4, pp. 35-137; “Le paléolithique en Extrême-Orient,” *Journal of the Anthropological Society of Tokyo*, vol. 47, n 10, pp. 363-380。見 Claude Cuénot, “Le Révérend Père Émile Licent S.I.,” p. 72。其中有關新石器的報告資料，經桑志華擴充後，以一本專書形式出版：Emile Licent, *Les*

方也開始收集北疆博物院當時所有的出版品。<sup>40</sup>此後，每年陸續有日本學者來此博物館參觀，包括日本史前學的奠基人物之一大山柏公爵（Oyama Kashiwa）。<sup>41</sup>

除了學界之外，宗教界對於這座博物館的建設也十分關注。例如 1930 年末，剛恆毅大主教（Celso Costantini, 1876-1958）在返回歐洲的途中，經過天津，特別參觀了工商學院和博物館，對相關建設大加讚賞。<sup>42</sup>

桑志華在 1914 年抵華後，中間只曾在 1925 年短期返法一次，<sup>43</sup>最後則是在 1938 年 5 月被召回法國。他個人原本希望不久後能夠重返中國，卻因種種因素不能成行，從此在法國度過餘生，在 1952 年過世前，不曾再有機會回到天津北疆博物院。失去了創建館長的北疆博物院先是在 1939 年遭遇水災，損壞了一部份的標本。1940 年又因中日抗戰，天津工商學院收容許多無法返回南方故鄉而滯留北方的學生，決定將博物館的空間暫時改為宿舍。時任代理館長的羅學賓遂與困守北京的德日進商量，合力將重要館藏先移至北京一處法軍撤退後遺留下來的軍營保存。德日進並且在這段時間以此藏品基礎創立一個地質學生物學研究所（Institut de Géobiologie），<sup>44</sup>繼續進

*collections néolithiques du Musée Hoangho Paiho de Tien Tsin,* (Tien Tsin : Mission de Sien Hsien, 1932)。書中序言部份，桑志華特別感謝當時請他去演講的兩位日本學界友人：A. Matsumura 和 K. Shimamura。

<sup>40</sup> 解成編著，《基督教在華傳播系年·河北卷》，頁 523。這份資料關於此事的記載如下：「日本天皇通過軍界最高參謀長寫信給桑志華神甫，請他把關於北疆博物院所有著作都寄送日本，為能出版。」文中沒有交代相關細節，在目前資料不足的情況下，筆者無法確知此事之原委。

<sup>41</sup> 解成編著，《基督教在華傳播系年·河北卷》，頁 532。

<sup>42</sup> 解成編著，《基督教在華傳播系年·河北卷》，頁 522。

<sup>43</sup> 此次行程時間為：1925 年 10 月 7 日出發，1926 年 6 月 15 日返回中國。根據 Claude Cuénot 提供的資料，桑志華此行是為了拜訪歐洲各界，替新博物館宣傳，以籌措建設博物館的資金。事實上，博物館從買地、建造以及室內裝備，前後耗費將近八萬到九萬墨西哥銀元，合當時約一百萬法郎。見 Claude Cuénot, “Le Révérend Père Émile Licent S.I.” p. 35。

<sup>44</sup> Pierre Leroy, “L’Institut de Géobiologie à Pékin, 1940-1946. Les dernières années du P.

行整理標本和出版的工作，一直到 1946 年 4 月初匆匆離開中國為止。1952 年，北疆博物院被天津市接管，先是改名為天津人民科學館，後來歷經幾度改制，變成現在的天津自然博物館。<sup>45</sup>

## 二、桑志華與法國自然史博物館往來關係

在取得博士學位之後，一直到出發前往中國以前，桑志華神父曾在法國與英國的自然史博物館內做了一些準備工作，主要是瞭解這些博物館有關中國北方古生物與現代生物的標本收藏情況。同時，他也如同許多要到世界各地探險、出差、旅遊、洽公的業餘自然史愛好者一樣，曾經前往巴黎自然史博物館受短期訓練，學習採集以及考古挖掘的技術，並且與該機構的教授討論，瞭解自己可以貢獻心力的地方。他首先與昆蟲學部門的教授請益，另外也透過耶穌會同僚德日進的介紹，認識了古生物學教席步勒（Marcellin Boule）教授以及在古人類學中心任教的步日耶（Henri Breuil）。所以他在旅華初期，分別寄了一些標本給大英博物館和巴黎自然史博物館。其中一部份是要請求幫忙鑑定，另一部份則是純粹贈與。寄給法國巴黎自然史博物館的部份，除了 1920 年代才開始寄的古生物類標本，之前曾經陸續寄了 4000 種藥用植物、蕈類、苔蘚類，以及一系列昆蟲類標本等等。<sup>46</sup>因為長期合作的關係，他在 1927 年並且獲得法國自然史博物館通訊員（Correspondant du Muséum）的頭銜。

Teilhard de Chardin en Chine,” *L'Anthropologie*, 69(1965): 360-367. 有關該機構的中文名稱，此處乃根據當時機構出版品中所標示。

<sup>45</sup> 見陳錫欣，〈崢嶸歲月，氣象萬千——天津自然博物館概況〉，收於陳錫欣主編，《天津自然博物館八十週年》（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1994），頁 1；李建麗、陳建華，〈河北省博物館事業一百年〉，收入中國博物館學會編，《回顧與展望：中國博物館發展百年》（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頁 62。

<sup>46</sup> Emile Licent, *Le Paléolithique de la Chine* (Tientsin: Musée Hoangho Paiho, 1929), p. 6.

也由於這層關係，他在 1923 年促成德日進到中國與他一起進行實地田野工作的機會，這也就是一般所稱的法國古生物考察團。<sup>47</sup>但這件事也成了日後他與步勒產生爭執的開端。

以古生物考察團本身進行的過程而言，兩位神父其實合作無間，專長互有所補。德日進在 1923 年 5 月中旬抵華後，兩人主要目標是深入挖掘桑志華在前一年鎖定的薩拉烏蘇遺址。另外，兩人也利用剩餘時間前往桑志華在 1922 年發現但是尚未深入瞭解的水洞溝遺址試掘，結果陸續挖出了三千多枚舊石器時代石器。兩人實地調查和挖掘過的地點所分佈的面積大約有三萬平方公里之大。在德日進要求續留後的半年之間，兩人將調查點擴及蒙古東部，在當地發現較多的則是新石器。1924 年底，當德日進返回歐洲時，帶回去研究的有 1922 年桑志華個人發掘的部份，以及 1923 年他們兩人在古生物考察團的名義下所發掘的標本。兩位神父合作所得到的可觀成果，其重要性不亞於任何大型的考察隊，例如安特生在其頗為暢銷的《黃土的兒女》一書中就特別用一整章來說明他們發掘的重要性。<sup>48</sup>在法國古生物考察團的工作期限結束後，桑志華與德日進還曾經在 1927 年一同再去田野考察。兩人在 1924-1930 年間一起掛名發表的相關文章就有十多篇。<sup>49</sup>德日進與在北疆博物院結識的其他傳教士科學家如湯道平、羅學賓等人也有良好的合作關係。

桑志華與步勒的爭端則是發生在 1928 年。這一年，由步勒、步日耶、德日進和桑志華四人聯合掛名的一本書出版，書名是《中國舊石器時代》。

<sup>47</sup> 有關德日進來華背景以及在華工作的細節，請參考：戴麗娟，〈周口店發掘時代的一名法國顧問——以新近出版的德日進書信集為基礎材料的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9.1(2008) :95-161。

<sup>48</sup> Juhan Gunnar Andersson, *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 第八章。

<sup>49</sup> 見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Teilhard de Chardin en Chine: Correspondance inédite (1923-1940)*, ed. Amélie Viallet and Arnaud Hurel (Paris: Les Éditions du Muséum; Aix-en-Provence: Éditions Édisud, 2004)一書最後有兩位編者針對德日進出版中有關中國史前考古部份的初步整理。不過其中有將當時中國期刊名錯列的情形。

全書分三個部份：第一部份由德日進與桑志華合作，分析遺址的層位。第二部份有關古生物化石分析，是由步勒與德日進主筆。第三部份有關考古石器物件，則是由步日耶掛名。<sup>50</sup>該書可算是法文世界裡首先完整介紹這個領域相關研究成果的專書。以當時法國史前考古學在歐陸的龍頭地位，該書應該也受到歐陸其他史前學者的關注。但是此書出版後，桑志華卻頗有怨言，因此還自行在天津出版了一個同名小冊澄清此事。<sup>51</sup>原因是步勒雖掛名作者，但是在出版前，他根本沒收到校對稿，未能充份表達他的意見。另一方面，在出版後，他也僅收到一冊書。也是在這一冊書中，他才發現在步勒所寫的前言中，根本沒有說明他才是考察團的團長，也沒有說明黃河白河博物館（北疆博物院）在中國田野發掘上的貢獻，而書中多處舊石器的發現都被說成是德日進的發現，巴黎自然史博物館的角色也被放大。至於提到桑志華的部份，只說他做了準備工作，並且提供地理路線的訊息。桑志華認為他的智財權（propriété scientifique）完全沒有受到尊重，因此寫信要求步勒在公開文章中更正，但沒有得到回應。他從此不願再與巴黎自然史博物館合作，並且開始追討他以往寄到該機構的標本。

他在與書名相同的說明小冊中，詳細描述自己當初發現薩拉烏蘇遺址和水洞溝遺址的經過，以及他如何與德日進聯繫，並且寫信給德日進的兩位上司（巴黎天主教學院的 Mgr. Baudrillart 和巴黎自然史博物館的步勒），希望他們能讓德日進到中國一趟，與他一起進行田野觀察和發掘。他也提到自己是考察團團長，而非步勒在法國對外宣布的德日進。事實上，在 1924 年底，當德日進返回歐洲前夕，桑志華曾經針對此考察團與後續運作寫成一份備忘錄，由他與德日進共同簽署。備忘錄便是他以團長的身份寫成，其中他試著

<sup>50</sup> Marcellin Boule, Henri Breuil, Emile Licent &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Le Paléolithique de la Chine, Archives de l'Institut de paléontologie humaine. Mémoire 4* (Paris: Masson, 1928).

<sup>51</sup> Emile Licent, *Le Paléolithique de la Chine* (Tientsin: Musée Hoangho Paiho, 1929).

釐清北疆博物院與法國古生物考察團的權利義務關係，乃至於與出資成立古生物考察團的巴黎自然史博物館之間的關係。也提到標本的贈送與寄送等等的問題。<sup>52</sup>步勒在看過備忘錄後，也同意此安排，並且曾經回信給桑志華感謝他的協助。

事實上，經過近十年在中國北方的地理和田野考察，桑志華對於考古遺址的調查為後到者省去不少尋找遺址的時間，這的確是有功在先。而且當時華北多處有盜匪出沒，若沒有相當的組織長途旅行的經驗，是沒有辦法讓田野工作團隊順利達成任務的。再加上德日進不諳中文，許多在田野當地發生的事情的確是依賴桑志華張羅。然而種種這些辛勞在出版的書中皆被步勒略去不提或僅是匆匆帶過，難怪引起桑志華的不滿。

至於標本歸屬問題，由於考察團出資者為自然史博物館，桑志華當初在洽商的信以及最後的備忘錄所訂下的原則是：出土物件若是唯一的一件，就送到巴黎自然史博物館，但是該博物館應該複製一件寄給北疆博物院；出土物若有重複多件，則選其中一件送給巴黎自然史博物館，其餘重複者留在北疆博物院，並且由桑志華在其中挑選一些送給中國地質調查所。運費當時是由法國方面包含自然史博物館、科學院、教育部等幾個單位共同出資，北疆博物院則提供人力與物力的協助。

在與步勒的爭論中，桑志華一再強調北疆博物院的獨立性，也強調許多遺址的地點其實是不同教區的教士提供的資訊。另外，他也十分維護中國當地出土物的歸屬問題。在他寫給步勒要求更正的信中，他就指出一些稀有的出土物件當初被寄往巴黎，曾經要求過法國方面要複製一份，寄回北疆博物院存放，「因為畢竟這些標本是在中國挖掘出來的，中國當地理應起碼有一件複製品」。<sup>53</sup>但是這樣的諾言，法方並未全面實現。事實上，早在 1920 初

<sup>52</sup> 此備忘錄原件在巴黎耶穌會檔案中心桑志華檔案中存有一份。不過在桑志華的說明小冊中已經全文收錄，見 Emile Licent, *Le Paléolithique de la Chine*, p. 6-7。

<sup>53</sup> Emile Licent, *Le Paléolithique de la Chine*, p. 7.

期的一篇文章草稿中，桑志華就已經寫到：「出土於中國的應當留存於中國」（*Tirés du sol chinois, ils resteront en Chine*）。<sup>54</sup>從這個角度看來，桑志華大概是當時曾經在中國進行過考古發掘的外國人中少數持有這樣觀念的人。

### 三、結語

企圖建設巴黎為世界科學中心的法國學者總是希望巴黎博物館擁有的標本、資料愈多愈好，而對於外派或有機會長駐海外的採集者加以種種訓練、動員和組織，目的就是希望能從世界各地將標本安全送回法國，擴大研究資源。在這種科學資本往中心累積，研究成果卻未必回饋給提供物件地區的帝國主義作風主導下，「中心」與「邊緣」是長期不平等分配下形成的結果，最後也導致中心愈是中心，而邊緣永遠是邊緣，兩者關係模式極難逆轉的趨勢。

藉著在中國北方建立一個自然史博物館的宏願，桑志華嘗試在這種不平等關係中尋求起碼的平等，並且動員長駐華北的歐洲傳教士的力量來累積標本，集中收藏於建立在當地的北疆博物院。他在「邊緣」建立「中心」的企圖可見一斑。然而在動亂年代中，永續經營實非個人意願即可達成。在他有生之年，也許未能見到自己的心願實現，但是他所留下的科學遺產，成為日後國家級的天津自然博物館的基石，在大半個世紀後，究竟開花結果。

<sup>54</sup> 文章草稿，標題未定，存於巴黎耶穌會檔案中心，編號 JLI90。

附錄



## 徵引書目

李建麗、陳建華，〈河北省博物館事業一百年〉，收入中國博物館學會編，《回顧與展望：中國博物館發展百年》，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頁60-66。

《河北大學史》編纂委員會編，《河北大學史》，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1。

胡 適，〈治學的方法與材料〉，《胡適文存·三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30。後收入《民國叢書·第一編》，綜合類，第 95 冊。上海：上海書店，1989，頁 187-205。

陳錫欣，〈崢嶸歲月，氣象萬千——天津自然博物館概況〉，收於陳錫欣主編，《天津自然博物館八十週年》，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1994，頁 1-3。

黃爲龍，〈我國最初發現的舊石器地點究竟在哪裡？〉，《化石》 3(1979): 29。

解成編著，《基督教在華傳播系年·河北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

賈蘭坡、黃慰文，《周口店發掘記》，天津：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1984。

趙慶源編著，《中國天主教教區劃分及其首長接替年表》，台南：聞道出版社，1980。

戴麗娟，〈周口店發掘時代的一名法國顧問——以新近出版的德日進書信集爲基礎材料的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79.1(2008): 95-161。

謝燕萍、游學華編著，《中國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址》，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4。

Andersson, Johan Gunnar. *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LTD., 1934.

Bernard, Henri. S. J. "Une méthode d'exploration scientifique : Le P. Licent dans la

- Chine du Nord et la collaboration des missionnaires”, *Bulletin catholique de Pékin* 12(1925): 443-454, 1(1926): 17-23.
- Bonneuil, Christophe. *Mettre en ordre et discipliner les tropiques: les sciences du végétal dans l'empire français, 1870-1945*, thèse doctorale. Paris: Université Paris VII-Denis Diderot, 1997.
- Bornet, Paul. “Le Père Emile Licent (1876-1952)”, *China Missionary Bulletin* (1952): 729-734.
- Boule, Marcellin, Henri Breuil, Emile Licent and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Le Paléolithique de la Chine, Archives de l'Institut de paléontologie humaine*. Mémoire 4. Paris: Masson, 1928.
- Bourguet, Marie-Noëlle. “La collecte du monde : voyage et histoire naturelle (fin XVII<sup>e</sup> siècle-début XIX<sup>e</sup> siècle)”, in *Le Muséum au premier siècle de son histoire*, edited by Claude Blanckaert et al. Paris: Editions du Muséu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 1997, pp. 163-196.
- Brockway, Lucile H. *Science and Colonial Expansion: the Role of the British Royal Botanic Garden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Inc., 1979.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Chiva, Isac. “Le Musée-laboratoire, service public de la recherche”, *Ethnologie française* 1(1987) : 61-63.
- Cuénot, Claude. “Le Révérend Père Émile Licent S.I.”,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s études indochinoises* 41(1966): 9-83.
- Dehergne, Joseph. S. J. “Les débuts d'un naturaliste en Chine: les premiers voyages du Père Heude d'après son Journal et ses Lettres (1868-1875)”, *Bulletin de l'Université l'Aurore* Ser. 3, 30(1947): 192-243.
- Fiskejö, Magnus, and Chen Xingcan. *China Before China: Johan Gunnar Andersson, Ding Wenjiang, and the Discovery of China's Prehistory*.

- Stockholm: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2004.
- Laissus, Yves. "Les voyageurs naturalistes du Jardin du roi et du Muséum d'histoire naturelle: essai de portrait-robot", *Revue d'Histoire des sciences* 34.3-4(1981): 259-317.
- Latour, Bruno. *Science in Action: 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P, 1987.
- Leroy, Pierre. "L'Institut de Géobiologie à Pékin, 1940-1946. Les dernières années du P. Teilhard de Chardin en Chine", *L'Anthropologie* 69(1965): 360-367.
- Licent, Emile. *Bibliographie critique du Musée Hoanghe Paiho de Tien Tsin (1914-1933)*. Tientsin : Musée Hoanghe Paiho, 1934.
- . *Les collections néolithiques du Musée Hoangho Paiho de Tien Tsin*. Tien Tsin : Mission de Sien Hsien, 1932.
- . *Dix années (1914-1923) dans le bassin du fleuve jaune et autres tributaires du golfe du Pei Tcheu Ly*. Tientsin : La Librairie française, 1924.
- . *Douze années d'exploration dans le nord de la Chine, en Mongolie et au Tibet (1914-1925)*. Tientsin : Musée Hoangho Paiho de Tientsin, 1926.
- . "Les gisements néolithiques représentés au Musée Hoangho Paiho de Tientsin", *Journal of the Anthropological Society of Tokyo* 46.2-4(1931): 35-137.
- . *A Guide to Hoang ho Pai ho Museum*. Tientsin : Musée Hoanghe Paiho, 1937.
- . *Le Paléolithique de la Chine*. Tientsin : Musée Hoangho Paiho, 1929.
- . "Le paléolithique en Extrême-Orient," *Journal of the Anthropological Society of Tokyo* 47.10(1932): 363-380.

- Needham, James G. *A Manual of the Dragonflies of China. A Monographic Study of Chinese Odonata.* Peiping : The Fan Memorial Institute of Biology, 1930.
- Piel, Octave. S. J. "Le 70<sup>e</sup> Anniversaire du Musée Heude", *Bulletin de l'Université l'Aurore* Ser. 2, 38(1938-1939): 8- 46, 39(1938-1939): 56-59.
- Sheets-Pyenson, Susan. *Cathedrals of Science: the Development of Colonial Natural History Museums during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Kingst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88.